

怀旧集

郑超麟 著

東方出版社



怀旧集

郑超麟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润生

装帧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怀旧集 郑超麟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3

ISBN 7-5060-0527-1

I. 怀……

I. 郑……

Ⅲ. ① 历史人物-中国共产党 ② 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

Ⅳ. ① K827.6 ② D231

怀 旧 集

HUAI JIU JI

郑超麟 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1.125

字数：230千字 印数：1-2000册

ISBN 7-5060-0527-1/K·123

定价：15.80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1)
记“少年共产党”	(29)
八七会议会址问题已经解决	(59)
记罗亦农	(62)
党史三讲	(93)
回忆陈延年乔年兄弟	(121)
共产国际的电报是谁拿给汪精卫看的?	(128)
再写八七会议	(131)
关于陈独秀若干问题的解答	(139)
回忆沈雁冰	(165)
三写八七会议	(187)
关于陈独秀和任弼时的冲突	(199)
陈独秀出狱后绝无复回中共的愿望	(203)
对瞿秋白的一些回忆	(209)
亚东图书馆保存瞿秋白文稿的经过	(222)
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	(226)
对《陈独秀传略》(征求意见稿)提出几条意见	(233)

一段回忆	(241)
记汪泽楷	(258)
中央文化委员会是谁领导的?	(272)
九十自述	(282)
颠倒的照片必须颠倒过来	(291)
记何资深	(294)
重游龙华警备司令部	(315)
纪念《向导》创刊七十周年书面发言	(323)
第三次入狱梗概	(328)
鬓霜初偿苏州梦.....	(343)
记谢澹如.....	(348)

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我做过瞿秋白的秘书——

我做过瞿秋白的秘书。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不久，中央调我离开湖北省委去中央工作。没有秘书名义，事实上是瞿秋白的秘书。我住在他的家（汉口，原英租界，一套公寓式房子，正式四个房间，厨房和卫生间在外），受他的委托办事，陪他出门访客。他要我设法在武汉恢复《向导周报》。一九二七年春，中央迁至武汉以后，我就不管《向导周报》工作了。不知何时《向导》停止出版，此时，中央决定恢复出版。由于上海迁来的中央印刷所仍在工作，中央新开的纸行我也熟悉，似乎毛泽民负责的发行机构仍在汉口。我出去联系一下，发现这些机构都瘫痪了，无法进行工作。我回报了秋白，只好作罢。

秋白有几次带我去汉口的苏联领事馆，我坐在门房等他，他进去每次都是相当长时间以后才出来。我们走路回家。路上他告诉我新的消息。例如，九月间一次，他从领事馆内出来就告诉我：“现在要退出国民党”。又有一次，他

拿出俄文文件给我看，问我 Партизанская Война 译为甚么才好。我拟了几个译名，他都不中意，最后还是他自己想出“游击战争”的译名。现在已经约定俗成了，我当时并不认为十分妥当，因为“游击”是旧时军官的一个官名。

并非每次都是我陪他去苏联领事馆。与我同时住在秋白家中的还有杨之华的妹妹和另一个男青年，姓盛。二人同住一个房间，已有婚约。杨之华告诉我，要给他们举行盛大的婚礼，使邻居免除怀疑。可是来不及举行了。一天，这个姓盛的青年人慌慌张张地跑回家来，对杨之华的妹妹说，他从苏联领事馆拿来的五千元在路上被人抢走了，无颜再见秋白，只好乘船回上海去，这钱是秋白叫他去拿的。我们研究此事，一致认为被抢是假，捲逃是真。杨之华的哥哥到轮船上找到这个人，他说的仍是那一套话，但从神色可以看出是带款潜逃。秋白告诉我：这个青年人要为这五千元葬送了一生，朵思退也夫斯基小说中写了类似的故事。我不知道他指的是朵思退也夫斯基哪篇小说。罗亦农颇不满意，对我说：“秋白亲亲戚戚！”我们回到上海以后，杨之华有一次告诉我，她的妹妹找到了那个姓盛的青年，发现他在邮局有存款。杨之华又说，二人的婚事吹了。不久之前报纸上发表一位姓吴的女同志追悼她的姨母杨之华的文章。这位女同志当是那年只有十五岁的杨之华妹妹的女儿。

九月下旬，中央从汉口迁回上海。杨之华后走，我陪瞿秋白乘船，二人住在一间官舱。秋白不出舱门，我则常常

在门外周围警戒。船上大概另有警戒的人，因为我们住进旅馆之后不久，中央交通处王警东（即王凯，解放初年作国务院机要交通局局长），便来旅馆接秋白去了。我仍在旅馆住着。

秋白曾告诉我，叶贺军队占领广州以后，中央就要迁去广州，那时要派我主持上海联络站的工作。可是，到上海后放弃了迁广州的计划，派我仍旧负责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出版，发行的工作。我在兆丰花园（即后来的中山公园）东边愚园路上租了一幢弄堂式的洋房子。秋白代表中央出席我们的编辑委员会，代表编辑委员会向中央汇报工作。我建议不用《向导》旧名，而用《布尔塞维克》，不是周报，而是半月刊。秋白同意了，刊名就是他写的。〔1〕

《布尔塞维克》

党报编辑委员会成立后，我就不再执行秋白的委托了，也不再陪伴他出门了。他每半月来愚园路一次，我则不定期地去他家找他。他起初住在福煦路民厚里对面，后来搬到池浜路（今名慈溪路）附近。我不是他的秘书了，但仍旧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我并非做了他的秘书以后才同他厮熟。一九二五年和二六年在上海，他就常到中央宣传部来（我住在这里），我也常到他的西门路家中。我从侧面知道他的家世，他也正面告诉我一些个人生平。他说，他的母亲是穷得没有办法吞红头

火柴自杀的，他的父亲住在济南的“同善社”，他每月要寄三十元到济南去。我认识他的二弟匀白，三弟景白，似乎都靠他维持生活。他的生活费（50元）是不够用的，我又从侧面知道他替塔斯社写稿，得到相当高的报酬。

常到他家作客的，蒋光赤之外就是我。蒋光赤写了几本小说，事先都同他商量，写好也先给他看，那本《短裤党》书名就是他取的。老蒋想不出适当的书名，秋白把书的内容联系到法国大革命的Sans-Culottes去，因名为《短裤党》。其实，culottes是短裤，贵族穿的华丽的短裤，平民穿不起，被贵族讥为“无短裤可穿的人”。sans等于英文的with out。把sans-culottes译为“短裤党”，是错的。这本小说写的一个主角就是瞿秋白，其中也写了我的影子。蒋光赤所写小说中，这是最好的一部。但秋白一次告诉我：这个人“没有天才”。我不写小说，不写新诗，秋白常同我谈旧诗词，他最欣赏秦观的词。他主张用词的语言写新诗。我们二人都喜欢龚定盦的诗。一九二六年底或一九二七年初，湖南农民运动高潮时，一次他告诉我，老龚那句“我闻大地狮子吼”可以用来为湖南农民写照。他临死前写的《多余的话》中一首《浣溪沙》把老龚的“莫抛心力贸才名”改几个字为“莫抛心力作英雄”。所以我一看见这篇文章就断定是他亲笔写的。

《布尔塞维克》的发刊辞是他写的。全部三十几期刊物，今天当然还保存着，我已不记得发刊辞说些甚么话。我记得刊物的目的是宣传共产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

军阀，反对国民党。我们都很“左”。秋白提出要批评孙文的三民主义，分几篇写，最后印成小册子。他要我写。我没有把握，推给他，结果照他的计划写成了。后来我们印成小册子，但用民智书局出版的孙文《三民主义》的现成封面，到处散发。有人去商店买物时故意遗留了一本在柜台上。书写得很好，但以后没有重版，解放后更不会重版。因为书中直接攻击孙文，称之为“孙中山陛下”，而遵义会议以后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不肯放弃孙文这尊偶像的。

我把社论以及政治性的文章推给他写，自己则写次要的文章。我不能参加中央常委会议（迁武汉以前，我愿意时都可以参加中央常委会议），政策靠秋白传达，没有把握写出符合政策的文章。可是，在十一月间，中央开全会讨论重大决策，秋白不能来参加编委会，因此《布尔塞维克》第四期的社论只好由我执笔了。当时报纸说，张作霖要做皇帝，成立“大龙帝国”。于是我抓着这个题目写了一篇社论，大意说：中国要么成立军阀帝国，要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至于国民党那种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没有前途的。出版以后，中央常委之一李维汉提出反对，说我们的口号是工农民主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郑超麟文章错了。秋白来编委会传达这件事，次期（第五期或第六期）秋白写了社论，说第四期社论说得不正确，应当更正^{〔2〕}。我却没有因此戴上了甚么“极左”的帽子，但我从此更加不敢写纲领性文章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或十二月的中央全体会议已开始纠正左倾路线了。

《布尔塞维克》编委会起初只有秋白和我，外加编委会的秘书黄文容。他是上海大学学生，一九二六年调来中央宣传部工作，一九二七年比我先去武汉，调去做陈独秀的秘书，中央迁回上海后他复回宣传部（编委会）作秘书。不久之后调罗绮园来，参加编委。以后几个月又调曹典琦来。再以后，黄文容调去中央组织部做干事，谢觉哉代替他的工作（但我从未想让谢觉哉做黄文容的秘书工作，我自己做黄文容的工作）。张采真夫妇从福建来，也曾住在编委会工作。稿件除各编委所写，还有同志投稿，有中央秘书处转来的，也有直接投到编委会来的。后者例如李圣悦，他是黄文容的同学，朋友，以“星月”为名投了一次或二次稿。李圣悦以后改名李平心，又名李鼎新，成为有名的学者。瞿秋白对《布尔塞维克》负政治责任，他除了“纠正”我的一篇社论外从不干涉我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四月间他准备去苏联开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同我告别，把《布尔塞维克》的编辑工作全部交给我，并委托我代表中央去指导创造社的工作。我们分手时私人感情还是很融洽的。六大以后，他被留在莫斯科，不能回国。据说，他向新中央宣传部长蔡和森推荐我继续担任《布尔塞维克》的主编。蔡和森不久下台，李立三代替他做宣传部长。我在工作上同李立三多次发生磨擦，我请他另外派人代替我的工作，他自然不许可，但一面向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征询意见。此时瞿秋白知道我不再适宜做这个工作了，于是派吴季严（原名吴稽天）回国代替我，吴未回前要我把

工作移交给潘文育（也是莫斯科新回国的）。一九二九年一月我离开了《布尔塞维克》编委会。

八 七 会 议

一九二八年四月我同瞿秋白分手后就不再看见他了。我听到他的零星消息，最后获悉他被国民党枪毙于我的家乡福建，又在《国闻周报》上看到他死前写的《多余的话》，以及几首诗词。解放前后看见他的著作《乱弹》和《海上述林》，以及鲁迅怀念和赞美他的话。我也认识他在三十年代居留上海时的居停主人谢澹如，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对他这个人的评论是变化无常的：起初尊为烈士，后来斥为叛徒，现在又把他的遗骨送回八宝山公墓安葬了。我对他有我的一贯的看法，不受中国共产党几次变化的评价所影响。但要说明我对他的看法，必须从我认识他时说起，必须倒叙八七会议以前的事情。

先说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是瞿秋白主持的，特别同瞿秋白有关。七月间，他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谭平山，张国焘，周恩来等人去江西，据说在庐山或九江开了重要会议，决定起义之后，别人留在江西，他回到武汉来主持中央工作。这是“据说”，我当时在湖北省委做工作，不知道中央领导人的行踪，也可能他根本没有离开汉口。八月六日晚上，我忽然得到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通知，叫我次日早晨参加一次重要会议。次日我去了，地点在旧俄租界一条热闹街

上（我忘街名，记得与长江平行），下面是店铺，店门旁有个楼梯直通二楼。（我不记得是从这个楼梯上去的，还是从后门进去的。）楼梯上有一条走廊，前楼房门开着，我看见临窗躺椅上坐着一个外国人，美国传教士模样的，门上铜牌刻着Ransom（以后我在上海“中美图书公司”发现有一本Ransom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及其他字样。会场在后楼，房间不大，临窗摆着一张写字台，靠隔墙摆着一张双人床，床和写字台之间放着几把凳子。写字台右端坐着瞿秋白，左端坐着一个高大的俄国人，我未见过的。俄国人旁边坐着罗亦农。我坐在写字台前面。我的身后，毛泽东坐在床沿上。床沿上还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李震瀛。床上圈脚坐着几个人，其中一个经秋白介绍，是彭公达。瞿秋白先说几句话，我只记得他说明：到会的除郑超麟代表湖北省委和彭公达代表湖南省委参加以外，都是中央委员。俄国人说：“我叫Николай”。我不记得俄国人是否先说了话。后来知道，这人名罗明那兹，代替魏丁斯基（伍廷康）做第三国际代表的。

为甚么叫做“八七会议”，而不叫做“几中全会”呢？因为当时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不足法定人数。（不难查明当时留在武汉的中央委员是谁）。

会议只开了一个上午。全部工作只是通过罗明那兹起草的瞿秋白翻译的一篇《告同志书》。这个文件当然现在还保存着，因为会后油印了很多份，发给全国各地。秋白是个很优秀的翻译家，他的译文能使人看不出是翻译的，还是中国人

自己写的。自然，罗明那兹用俄文起草以前多半同秋白商量过，多半采纳了秋白的若干意见。我只记得这篇《告同志书》中批评了中共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但没有指名，没有一个字点出陈独秀。我当时认为把革命失败归咎于陈独秀是不公平的，但我没有说话。此外，这篇《告同志书》也并不认为革命已经失败，而是说革命走上了更高的阶段。

秋白宣读了《告同志书》以后，让到会的人发表意见。罗亦农首先发言，他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一点说国民党已经腐朽，不堪一击。他自己翻译给罗明那兹听。罗明那兹在这一点上驳斥他。罗明那兹说：国民党还有力量，我们要认真对待，绝不应轻视它。

似乎还有几个人发言。我只记得毛泽东站起来说几句话，但罗亦农制止他，不让他说下去，理由是：我们不安全，要提早散会。

我把八七会议记得如此琐碎，只为得还这次会议的真相。关于八七会议的传说是很多的，但都不合事实：参加的人，除我以外即使还活着，也不过一个或二个而已。报纸及公开发表的文章对于这次会议都是想像的，不是根据事实的。解放初年的人说：八七会议是在九江开的。不知何所据？后来说是在汉口开的，1978年或77年汉口甚至把八七会议的会场装饰起来让人瞻仰，我不能断言是不是当时的真正会场。我忘记了前面的街名，报纸说的街名也不能引起我的记忆。报纸说会场中摆了十几只凳子，那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至多有五六只凳子。八七会议之后，我又有二次去

这个会场。一次是去找某一个人（忘记是谁），我摸到那里去，在开会的房间我看到那里有五六位同志，有男的，有女的。男的中间有张坤弟，女的中间有玉兰英。另一次是中央常委在罗亦农家中开会，会尚未开，发生了情况，我们都从后门逃出去了，但奇怪的是罗亦农家的后门恰好斜对着八七会议会场的后门，我们穿过会场的后门，从前门溜走了。罗亦农家在“兰陵花园”南边的一座洋式二层楼房。“兰陵花园”周围都是这一类楼房，中间有一块大草地，两旁有长椅子供人休息。

更离奇的是传说的参加会议的人。据说，有张太雷，有蔡和森，有邓小平，有关向应。张太雷早已去广州就职了，蔡和森早已去北京就职了，邓小平当时可能在汉口，但他是在中央机关做工作的普通人员，不是中央委员，又不是代表甚么地方党委，没有资格列席这次中央会议。我不记得关向应是否五届中央委员，但我没能在会场上看见关向应的印象。

最离奇的是说毛泽东召集和主持了这次八七会议，在会议上长篇讲话，批评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罢免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而其实毛泽东站起来说三三句话就被制止了。陈独秀不是被人罢免的，而是自己辞职的。我以前只记得他于七月十五日武汉反劫后辞职，不知道何日，最近看《历史研究》杂志最近一期才知道他是七月三十日辞职的。

《热血日报》

我有意跳过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至一九二七年上半年这一段大革命高潮时期，而去写《热血日报》。那一段大革命时期将最后写。

五卅运动爆发以后，商务印书馆资本家为了表示爱国或其他原因，拿出一万元给职工办一张小报。职工们于是出了《正义日报》〔4〕。固然是爱国的，同情当时轰轰烈烈运动的，但态度温和而稳健。瞿秋白看到后对我说：哪里有甚么“正义”！我们自已来办一个《热血日报》罢。几日之后就办起来了。也许中央已决定办十个小报之后，秋白才同我说这话。中央此时也决定自己办一个印刷所，但来不及开工，《热血日报》还是由梅白裕路（今老新昌路）明星印刷厂承印的。筹备的事情是张伯简通过徐梅坤去办理的。编辑部设在闸北香山路东端与之垂直的路（似是宝通路，总之在东方图书馆西边）的一条弄堂内的最后一幢房子。编辑室设在楼上。发行所另在一个地方，我未去过，也忘记了谁负责。秋白做总编辑，从中央宣传部抽出我，从民国日报编辑部抽出沈泽民和何味辛（后名何公超）。一般分工是：秋白写社论，我写文章。沈何二人编新闻，二人有时也写文章。有些文章是外面投稿的，有几篇是杨洵（后名杨伯凯）投的，他新从法国回到上海，通过他的同乡石琮，把稿子送给编辑部。新闻稿子，各工会送来的更多，我们没有核实都登载

了。这中间出了一次乱子，那时有个宁波人在上海很活跃，外稿说他被帝国主义收买了，我们贸然发表了消息，于是有一群人去发行所责问。〔5〕

秋白社论都不署名，我用笔名“舒严”，有时也用其他笔名，今忘记了。

每天黄昏，我把全部稿子从闸北带回梅伯格路，排出后再校对（有时别人校对，其中有个方尔灏，福州人，校对了几期，此人在国民党背叛革命后死于福州），然后回民厚里睡觉。

最后，租界当局动手了，巡捕封闭了明星印刷厂，拘押了老板，罚了款，老板来编辑部交涉，张伯简同他接头，替他付出罚款。从此就停刊了。（那时中央印刷厂已筹备就绪，似乎我们自己印了一二期。）

那时瞿秋白和陈独秀每日碰头，他写的社论反映了中央的意见。彭述之在丑闻运动前因病住在宝隆医院，蔡和森也已去北京西山疗养，只有张国焘在上海。

上海大学

我一九二四年回国时，瞿秋白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上海大学共分三系。社会学系学生最多，其他是中国文学系和英国文学系。

上海大学是国民党办的，但大权操在共产党手中。总务长是邓中夏，社会学系教师，除系主任兼教一课外，尚有岑体诚（以后去杭州政法大学任教），施存统，张太雷，后来